

国别和区域研究视域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意义和范式

——以叙利亚古代史研究为例^{*}

王新刚^{**} 郭磊^{***}

内容提要 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提出的一项国家工程，其基本价值导向是为服务国家利益而面向各个地区和國家的基础知识研究和政策咨询。历史学和世界史学科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中承担着基础学科的职能，具有整体性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功能。通过对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知识产出意义和服务现实意义的分析探讨，世界古代史研究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应面向世界构建具有继承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东历史研究实践发展出来的“文明交往论”指导下的地区古代史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思维、中国智慧介入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探索路径。

关键词 国别和区域研究 叙利亚古代史 “文明交往论”

目前，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在学科建设上初步形成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直接领导，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共同参与的“由下至上，协同整合”的路径。然而，中国特色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目标和价值与国外的区域研究有何不同？历史学以及世界史学科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因无法产出直接经济利益和科技成果而被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叙利亚古代史研究”（2018VJX086）的阶段性成果。

^{**} 王新刚，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郭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财经大学讲师。

为“冷门”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中有无价值，价值体现在哪里？世界古代史参与国别区域研究的路径应如何构建？这些问题应引起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古代史学者的足够注意。纵观世界历史，叙利亚地区向来有“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之称，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近年来爆发的“叙利亚危机”又使其成为国际热点区域，加上其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西端，因而是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关注的重点地区。本文拟以探讨国别和区域研究视域下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意义和范式为案例，对以上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

一 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兴起背景与内涵特点

（一）国外区域研究的兴起背景与发展阶段

区域研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萌芽于古代中世纪、发展成熟于18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基于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不断深化以及殖民统治的需求，欧洲的东方学研究发展迅速，其在政治驱动力、对研究区域的划分、研究领域的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特点同区域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方学是区域研究的雏形，区域研究是东方学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进化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世界历史进入新的发展节点。一方面，旧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欧洲传统东方学的需求逐渐减弱、驱动力逐渐消散；另一方面，战争也成为区域研究新的“孵化器”，而这主要反映在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中。由于“二战”前受传统“孤立主义”政策的影响，美国社会科学界对于非西方世界关注甚少。但是，世界战争使美国产生了巨大的情报需求与对非西方世界知识的渴望。在此背景下，美国逐步建立起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和学者三位一体的区域研究体系。^①至此，美国开始接过了欧洲关注“他者”的接力棒。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双方都想了解对方，也都想争取新近独立和即将独立的亚非国家进入自己的阵营。这也导致美国对通

^① 梁志：《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

晓世界各国语言、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人才需求进一步提升。而对冷战的关注以及美国精英界关于国家需要在 20 世纪后半叶扮演更为宏大的国际角色的看法,成为 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建立美国区域研究的主要动力。^①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区域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首先,大量为战时服务的情报人员与政策专家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与研究成果,为区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很多大学成立了专门的区域研究机构,为区域研究的学科化与体系化奠定了基础。最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三大基金会与联邦政府一同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支持。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冷战走向终结,对非西方地区研究的“价值”陡然下降,区域研究在美国又一次失去了其主要驱动力。同时,美国社会科学界对区域研究的质疑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区域研究对政治和经济的过分依赖性以及研究方法科学性不足等方面,致使区域研究陷入低潮。不过,进入 21 世纪后,在“9·11”事件的刺激下,美国学习外国语言、历史、文化的需求增加,区域研究在美国又一次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②

(二) 国别和区域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同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区域研究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战略指向、发展阶段、研究内涵、价值导向等方面。1956 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建立了旨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进行调查研究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国际研究专门机构之一。1960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上海市成立。196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亚非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64 年,北京大学设立亚非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设立苏联东欧研究所、复旦大学设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西北大学设立伊斯兰教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外国问题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工作进展,形成了我国后来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概轮廓。

① 徐四季:《从古代东方学到现代区域研究——从学科史角度探究当前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位问题》,《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 年第 3 期。

② 参见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 21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改革开放之后,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渴求以及相关政策制定的需求,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文革”期间未能实际建立的一批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架构内设立;同时,各大高校也纷纷成立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相关研究方兴未艾。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参与,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成为迫切的现实需求。我国开始以专项工作形式探索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以及专业研究机构的建设路径。从2014年开始,教育部加大了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别和区域研究也从单一的专项工作上升为国家工程。在此之后,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数量大大增加,从初创时的几十家增加到数百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在我国迎来新的重大的发展机遇。

(三) 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内涵特点

关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定义、内涵与外延,目前国内外学者观点不甚统一。很多学者认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桑顿(David L. Szanton)教授的定义:“区域研究最好被理解为一种拥有共同承诺的学术领域与活动群集的涵盖性术语:(1)高强度的语言学习;(2)用当地语言深入实地调查;(3)对当地历史、观点、材料以及阐释的密切关注;(4)用细致观察来检验、制定、批判或发展基础理论;(5)经常超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界进行多学科交流。”^①

尽管不同学者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定义与内涵理解有所分歧,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特点依然较为鲜明。

首先,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非常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其研究内容是构建关于特定国家、特定区域的“知识体系”,具体涉及所研究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因而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之学,是一个“宏大理论”。^②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同欧美以及日本的区域研究关注点相比,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关注热点更加侧重于政

① [美]戴维·L·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与挑战》,载刘新成主编《文明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102页。

② 许伟通:《大学新使命:区域国别研究》,《高教与经济》2012年第3期。

治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从国内目前研究力量分配来看,相关研究人员多集中在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等一级学科之下。

其次,国别区域研究具有鲜明的“实学”特点,并非“象牙塔”内的科学。从国内外区域研究发展的背景来看,早期兴起于欧洲的东方学具有为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工具性特点;美国的区域研究分别在“二战”时期、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期美国推行世界霸权的不同阶段中提供政策咨询服务;而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起步与发展是在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从区域研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来看,早期西欧东方学研究多为殖民主义国家政府资助支持;美国的区域研究主要由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推动,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会出资;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在中央领导部署下,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学科整体建设。

最后,从知识体系获得、构建的路径来看,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相比,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特殊性、本土性和相对主义的特点。国别和区域研究通过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展研究从而提取特殊性的知识,与经济学、政治学基于普遍性的宏大理论研究路径有所不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国别和区域研究更倾向于对特定文化习惯、宗教信仰、艺术、价值观研究的相对主义模式而非理性主义模式。

二 国别和区域研究视域下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意义

(一) 我国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并非“东方学”或美国的区域研究的翻版,其产生背景蕴含于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其基本出发点与驱动力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从而实现互助互利、合作共赢的目的。简单来说,我国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面向基础的学术性、科学性“他者”知识的产出。对外开放进程的加速、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程度的加深需要我们加深对世界各国、地区的认识与理解，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对象就是关于不同国家、地区的整体性知识。

二是面向现实的政策性、服务性资政建议功能的建设。在掌握熟悉研究对象国家、区域知识的基础上，国别和区域研究为国家参与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外交政策的制定、对外投资分析等现实问题提供咨询与建议。

三是面向世界构建具有继承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国外区域研究实践证明，区域研究可以从中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和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等均为显例。^①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应当坚持“一切从世界出发”，“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基本规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中国思维与中国智慧，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二）叙利亚古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知识产出意义

与今天特指叙利亚民族国家概念不同，“叙利亚”（Syria）这一名称在历史上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乌加里特语（Ugaritic）“Shym”和古希伯来语“Siryon”是这一词语的最早来源。^②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描述中，叙利亚经常以族群（ethnos）概念出现。在古代近东研究领域，叙利亚多作为地理概念出现并经常与另一地理名称“黎凡特”（Levant）混用，北部和西北部以亚玛奴山脉（Mt. Amanus）、陶鲁斯山脉（Mt. Antitaurus）以及上幼发拉底河（Upper Euphrates）为界，西至地中海，东部边界为叙利亚沙漠，向南延伸至阿拉伯半岛内夫德沙漠北端。^③涵盖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土耳其南部地区。

国内学界通常使用“大叙利亚地区”特指这一古代地理概念。公元前3000年左右，该地区出现埃卜拉（Ebla）、马瑞（Mari）等城市国家，并使

① 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

②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Syria, Including Lebanon and Palestine*, London: Macmillan Co. Ltd., 1951, pp. 57–58.

③ I. E. S. Edwards, C. J. Gadd, N. J. L. Hammon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ume 1, Part 2, Earl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15.

用类似古阿卡德语的埃卜拉语(Eblaite)文字书写体系,^①成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之一。古叙利亚文明在与埃及、两河、赫梯等域外文明交往互鉴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在人类历史上首创并成功实践字母文字和一神教信仰。大叙利亚地区也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和古代“丝绸之路”西段的咽喉要道,是多元文明交往互动的主要舞台,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因而,系统研究古叙利亚文明的历史演进和特征,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交往基本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个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是我们获得、构建该地区乃至其他相关地区“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的地缘位置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大叙利亚地区位于三大洲交会之地,同“域外文明”接触便利;从地形来看,大叙利亚地区被境内大山、大河、峡谷分为四个地形区,不利于域内交往;从气候环境的角度来看,大叙利亚地区沿海和南部地区属于适宜农业发展的“肥沃新月”,有着周边地区缺乏的雪松、铜、黑曜石等自然资源,成为同周边文明物质交往的重要驱动力。由于境内复杂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大叙利亚地区在历史上从未从内部统一,而“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的地缘位置,导致该地区非常容易受到域外文明的入侵。因此古叙利亚政治发展呈现一条基本规律:当周边国际政治环境缺乏主导力量时,该地区呈现小国寡民、城邦制的独居主义、分离主义特点。当周边出现强大霸权时,该地区往往会率先成为古代帝国的一部分。彭树智先生认为,地缘环境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支撑性条件,人类对环境的文化适应性交往的存亡,决定人类文明的兴衰,不同文明民族的差异,同各自地缘和环境有着密切联系。^②大叙利亚地区“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特性是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一条主要脉络。

第二,大叙利亚地区为一神教信仰体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正是在大叙利亚地区这一“文明交往十字路口”,搭建了诸古代文明宗教文化的交往舞台,并完成了各个文明精神文化元素的“分解—转化—输出”过程:希

① Trevor Bryce, *Ancient Syria: A Three Thousand Year Hist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3.

②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23页。

伯来人吸取埃及、两河以及波斯文明的文化元素，创立了犹太教。基督教最初作为法利赛人的犹太教变种在加利利出现，在希腊哲学思想、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宗教观念、近东上古宗教仪式多元文化影响下在大叙利亚地区发展成形，进一步吸收新柏拉图主义等希腊罗马哲学思想之后逐渐被罗马帝国接纳，成为塑造、定义今日之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大叙利亚地区是世界古代民族的万花筒。属于闪米特语系的巴比伦人、亚述人、阿摩利人、阿拉米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属于印欧语系的胡里安人、米底人，属于亚-非语系的埃及人，以及尚不能确定语系的喀西特人等诸多民族均在上古时期的大叙利亚地区登上历史舞台并留下鲜活的历史痕迹。这些都为民族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第四，最早的字母文字产生于大叙利亚地区。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在迦南产生了一种形同埃及象形文字的音节文字，共 80 个符号。公元前 14 世纪，乌加里特创造了包括 30 个字母的楔形的字母文字。腓尼基字母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革命。在西方，它经由希腊字母发展为拉丁、伊达拉里亚和斯拉夫系统的字母，在东方则催生出了古希伯来、阿拉米、古波斯、安息、亚美尼亚和阿拉伯字母。^①

第五，大叙利亚地区是人类农业革命的重要发祥地。考古学家最新研究表明，大叙利亚地区是人类早期农业革命的重要发祥地。在大叙利亚地区北部挖掘的公元前 10200 年至公元前 8000 年的穆赖拜特（Mureybet）遗址，公元前 1 万年左右大叙利亚南部地区纳吐夫文化（Natufian culture）遗址发现了人类用泥砖、芦苇搭建的简陋房屋以及种植小麦和饲养牛羊的痕迹。^②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厘清人类早期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别和区域研究视域下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谈到我国世界史研究对当今社会的意义与功用，学者一般会提到其还原历史和借鉴过去的作用。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

① 彭树智主编，王铁铮、黄民兴等著《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 34 页。

② 〔美〕欧弗·巴尔约瑟夫著，赵志军、翟少东译《近东地区农业的起源》，《南方文物》2014 年第 3 期。

学应当成为一门关于模棱两可的现在的科学。^① 而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具有强烈时代关怀的传统,其关注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外关系史、现代化进程等重大问题都紧扣不同时期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的需求。^② 具体到世界古代史的现实功用,要准确理解以下几组关系,即和当下中国之关系最密切的是当下之世界,其次是近代以及古代之中国,而近代之世界与古代之世界看似与当下之中国关系最为疏远,但是了解古代的世界是我们了解现今之世界的必由之路。^③ 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拔刀断水水复流的不可绝对加以分割的关系,用不同文明和内外文明交往的联系性和综合性进行思考这三者的关系,是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④ 同时,国别和区域研究热潮的兴起,更是为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关注现实和服务社会之间打开了通道。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也应当为我国参与全球事务、对外政策制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非仅仅局限于读史养性、陶冶情怀的人文层面。具体而言,叙利亚古代史研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现实意义。

首先,叙利亚古代史研究是从历史的维度去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路径。“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是该地区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然而,这些现实问题与矛盾均可在该地区古代的社会形态演变、民族融合、宗教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中溯源。例如当前“叙利亚危机”中存在的教派冲突和族群矛盾,实质上是叙利亚地区从上古时期形成的内部分离主义与因地缘政治重要性而易受外部干涉的政治特点的延续。随着叙利亚问题国际国内局势的逐渐明朗,叙利亚政治、社会、经济的重建问题浮出水面。谁来重建、如何重建,以及中国对重建应该如何参与、参与的节奏缓急等都成为中国下一步参与全球治理并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课题。所以,要想厘清这些现实问题,就必须考察其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背景。

其次,叙利亚古代史研究是洞悉中东地区区情,探究中东持续动荡的

①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0页。

② 钱乘旦:《世界史研究的时代关怀》,《人民日报》(理论版)2014年4月13日。

③ 刘家 and 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9页。

④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历史根源和实现中东和平策略的必要知识,同时可以为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当今的叙利亚与中国同属第三世界国家,而古代叙利亚涵盖的地区既是古代“丝绸之路”西段的咽喉地区,与中国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交往,又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重要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广阔的市场,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叙利亚古代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古叙利亚文明的特点,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与该地区在经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反对“东突”恐怖势力)等领域的合作,同时也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贡献微薄之力。

三 国别和区域研究视域下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范式探讨

(一) 增强历史学科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基础学科定位

有学者指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应打破学科壁垒,形成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共同参与的“由下至上,凝聚共识”的学科构建路径。^①事实上,以我国中东区域研究为例,目前主要流行的两个研究路径:基于“政治学—地缘政治”的研究路径,以及基于“历史学—文明交往”的研究路径。但无论从研究人员的数量、学科背景,还是研究机构、发表的著述和成果等指标来分析,前者在中国都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②而古代史研究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参与度更是严重不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③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④的重要论断。所以,确立世界史学科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基础学科定位是获取区域科学性知识的重要前提与基本要求。

① 罗林、邵玉琢:《“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② 王泰:《“文明”视野下的中东与复杂多元的“交往”——中国特色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术体系刍议》,《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46页。

④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新华网,2019年1月3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03/c_1123942672.htm。

首先,历史研究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总体性的方法论框架。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从纵向维度来看,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本学科的学科史研究,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科学史、自然史等研究是各学科的研究基础,同时也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研究范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社会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知能力。^①从横向的维度来看,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织方式,其本质是追求“整体的社会科学”。^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是整体知识链条上的一个个“铆钉”,而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是我们获得整体性知识的任务之一。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实践活动的学问,是一门综合之学。如麦克尼尔所言:“历史学如今可能成为其他学科的模范,因它涉及了我们所知的现实的最复杂层面,也就是物质的统一世界,这个世界引导着我们彼此互相作用。”^③历史研究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层面以及从个体到宇宙的空间层面将整体性的知识统一起来。从当前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现状来看,受科学主义物化观的影响,各个学科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而实现学科间的交汇融合需要总体性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从而提取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区域“整体性知识”。

其次,历史研究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指引。一般来说,史学的任务是从历史的遗骸或残迹中重认那些曾经活生生的历史,并以文字为手段将其重现出来。^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提出,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并承担起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探寻的神圣使命。追求全面重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与辩证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成为历史科学的一大法宝。受到“硬科学化”趋势的影响,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出现单纯追求普遍宏大的一般性系统理论的倾向,理性原则甚至成为评判某一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准则之一。然而,理性原则

①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73页。

② 罗林、邵玉琢:《国别和区域研究须打破学科壁垒的束缚——论人文向度下的整体观》,《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

③ Willian H. Mcneil, “History and the Scientific World View,”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No. 1 (1998), p. 13.

④ 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第7页。

所推理出的一般性、模型化的理论同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元性的特点无法统一。例如现代化理论、文明冲突论等宏大理论难以解释当今世界很多地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而历史研究注重从实际出发获得具体的特殊的知识,从规律出发获取普遍性的知识的方法构成了相互补充的两条路径。此外,学者们在国别和区域研究知识获取的过程中应注重通过历史学对特定地区的特殊性、本土性知识的提取与分析来不断验证、修正政治学、经济学的普遍宏大性理论,从而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与“从规律出发”的有机结合。

(二) 国别和区域研究视域下的叙利亚古代史研究应突出文明史的叙事方式

一般而言,世界史研究范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地域的叠加,把一个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分开写作,即国别史研究;二是事件的叠加,即以人类历史发生的事件为叙事单位;三是时间的叠加,即编年史的方式;四是主题的叠加,即把不同国家的相同主题写成一个个专题,如“新编剑桥某某史”是典型例证;五是现象的叠加,即文明史的研究范式。^①

文明史研究从启蒙运动开始兴起,通过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史学巨擘的著作为世人所熟知。马克垚先生认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过去的世界通史强调的是短时段的东西:政治事件、伟大人物,后来又加上了经济形势、文化情况等比较稳定的东西。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就是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②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叙利亚社会”^③的概念并将其列为21个重要人类文明之一,并认为叙利亚文明在近东地区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成为伊朗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母体。^④对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于探讨多元文明在这

① 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

②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导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③ 在汤因比的著作中,“社会”和“文明”两个概念经常交替出现,是一对同义概念。

④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王皖强、杜庭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2页。

一地区交往的表现形式,从而揭示人类文明交往的特点和规律。

首先,由于开放的地缘特征,大叙利亚地区的政治形态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在历史上出现城邦林立、大国藩属(各小王国公元前 2 千纪对埃及和赫梯的附庸关系)、帝国行省(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帝国中心(塞琉古王国、倭马亚王朝)等多种政治形态。如果采用传统政治史或民族史的研究视角,易于形成古叙利亚文明特征“波斯化”、“希腊化”或“罗马化”的误区并导致对这一地区历史研究的边缘化。以文明史的叙述方式,可以突出大范围、长时段的趋势和结构的意义,突破民族、地域、国家为叙事单位的局限性,凸显多元文明横向交往和人类文明纵向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从而最大化地体现叙利亚古代史的研究价值。

其次,文明史研究同国别和区域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布罗代尔认为,要阐释文明的观念,需要所有社会科学协力合作,其中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并将地理区域、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生态、人口、集体心态等方面内容均纳入文明研究的范畴。^①在具体古代文明的实践研究中,古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所倚重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

最后,国别和区域研究知识产出和服务现实的基本目标限定了此框架下叙利亚古代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相关研究应选取对地区和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或现象,并以宏观、中立的角度进行研究。此外,在选题上应该关注“丝绸之路”商贸历史、地区宗教文化发展演变、政治史发展特点等与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问题;生活史、科技史、艺术史等人文向度的选题可置于次要位置。

(三) 以“文明交往论”为理论指导开展叙利亚古代史研究

在知识产出和资政服务的目标之外,国别和区域研究还承担着面向世界、构建具有继承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理论的任务。世界史学科作为我国发展起步较早的人文学科之一,目前已经产生了以整体史观、现代化理论、文明交往论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路。^②“文明交

①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 41~56 页。

② 王泰:《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的三大学术理路及其探索》,《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4 期。

往论”是我国著名史学家、中东史研究奠基人彭树智先生在长期的历史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智慧在中东历史研究具体实践中升华抽象的理论，对叙利亚古代史研究以及国别和区域研究理论探索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文明交往论为叙利亚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导。文明交往论既立足于物质生产实践，又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为基本研究内容，以交往力为横线、生产力为纵线全面探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与规律。大叙利亚地区具有“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的地位与特征，其本土文明是在同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不断交往、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本地区重要的历史现象，如一神教的形成、世界性宗教的形成与传播、字母文字的发明与传播，均体现了文明内部生产实践的纵向发展与文明之间交往互动共同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规律。

其次，“文明交往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反映时代精神的理论创新，是基于文明研究但又鲜明地区别于西方文明史观的历史观念创新，是立足于历史个案研究并强调对文明交往互动做重点研究的方法与体系创新。^①“文明交往论”从中国的角度、以世界的情怀为叙利亚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理路，是构建具有民族性、创新性、理论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 语

中国特色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在中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型发展过程中应势而生的，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方式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性事务的立场与西方国家均有较大区别。因此，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以国家发展互惠互利对外关系，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目标的知识产出与政策咨询、服务工作。此外，中国的国别和区

① 王泰：《“文明”视野下的中东与复杂多元的“交往”——中国特色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术体系刍议》，《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

域研究还承担着面向世界构建具有继承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

历史学和世界史学科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应承担起基础学科的职能。历史研究为特定地区的整体性知识提供了纵向深度,同时,历史学为科学性知识的获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即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规律。以叙利亚古代史为例,一方面古代史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是构成认知“他者”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交往基本规律提供了充足的历史个案。就现实意义而言,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全面认识,而历史的“鉴今”功能可以为一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一门“实学”,在此框架下开展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在学术研究与为现实服务的政策咨询之间打开了通道,从而有助于摆脱世界古代史研究长期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冷板凳”地位。

国别和区域研究视域下的叙利亚古代史研究适宜采用文明史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文明史研究以历史学为基础,将地理区域、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生态、人口、集体心态纳入研究范畴,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从文明的角度进行的历史叙述,可以突出大范围、长时段的发展趋势和结构的意义,更符合国别和区域研究面向现实、构建整体性知识的特性。古叙利亚史研究还应突出“文明交往论”的指导意义。“文明交往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基于中东历史研究实践发展而来的具有中国思维与中国智慧的理论,具有民族性、全局性、创新性和理论性,在为叙利亚古代史研究提供体系、方法、理论指导的同时,对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刘金虎]